

新结构经济学的要义

林毅夫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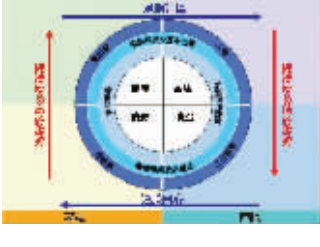
最近网上有许多文章评论我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以及我倡议的新结构经济学。对此,我个人深表欢迎,因为,真理只有在不断地讨论中才能辩驳清楚。不过,有不少质疑属于断句取意或望文生义,并未仔细了解我的论述或著作。刘海影先生在 FT 中文网上的评论《追问增长根源:也谈林毅夫假说》就是一个例子。

首先,我近日强调,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必须以投资为主体,但我并未如刘先生所断定那样,强调以“政府”投资为主体。就像现在不少强调中国应该以消费来拉动增长的学者并未强调要以政府消费来拉动一样。

其次,我强调政府必须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以克服外部性和协调的问题,但我并未如刘文所断定的那样,把政府在产业升级中“歌颂为主角”。实际上在新结构经济学的“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中产业升级选择的第二、三、四步是正如刘文所认为的“由无数微渺的个体、企业在为自身福利而不计血汗代价地冒险犯难、拼死努力中来决定的。”但是,正是由于这些无数微渺的企业无法解决基础设施、金融、法制等影响交易费用的企业外部环境的改善,因此,新结构经济学认为政府需要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来协调解决这些问题,提高这些无数微渺的个体、企业成功的概率。

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在实行了“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以后,30 年来除了易于收费的无线通信以外的基础设施未见改善,成为增长的瓶颈,就是因为误认这些无数微渺的个体、企业在市场环境中能自发协调解决这些外部环境条件问题的结果。我在世界银行时,经常听到非洲和东欧的许多国家抱怨,其投资和企业经营环境已按“华盛顿共识”的要求改善了十几、二十年,但是没有新的产业和就业机会出现,原因也在于此。如果,如刘文所主张那样,因为“政府可能会实施并不一定最有利于民众福利、却最有利于政府及其代理人自身利益的政

中国的经济波动,一直有一个怪圈,叫做“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说的是政府的紧缩之手一放开,经济就会充满活力,生产力好像从地缝、墙角里钻出来,然后就会“出问题”,比如“投资膨胀”,“重复建设”,“恶性竞争”,通胀也会跟着起来,引发新一轮收缩,周而复始,循环下去。这一规律早就已经被总结出来,近年来依然适用。



徐建国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在“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中,砍投资是首要的“收”的措施。居民消费本来就涨得不快,而且通胀之下民生本来就是问题;压缩政府消费伤筋动骨,需要政治家的智慧与勇气;出口由国外需求决定,调控起来没那么直接和容易。剩下的就是投资了,而且投资在 GDP 中的占比大,就像一块肥肥的唐僧肉,看起来好下口。

投资也是 GDP 中波动最大的一块,繁荣的时候上得快,调控的时候砍得凶。经济上升时往往伴随着投资的快速增加,而且各地竞争,项目争相上马,唯恐比别人落后了。而且,在各地从银行挖贷款的积极努力下,信贷往往也很配合,货币供应快速上升,导致短期内总需求超过总供给,引发通胀。至少从经济波动的成分看起来,经济周期就是“投资周期”。

投资中很大的一块是基础设施投资,也是政府能够“砍”的重要对象,因为这一块是政府主导的。相对来说,对于非基础设施投资的调控要间接很多。进一步,正因为基建大都



策”而反对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我认为这是因噎废食,并不能真正有助于这些无数微渺的个体、企业。

既然,政府要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就要减少因无知而犯错误。所幸,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企业都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来甄别可能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提高升级成功的可能性。而且,由于政府可动用的资源有限,在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上,不管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必须有选择、有方向地使用那些资源。其实,发达国家所惯用的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四种主要手段,专利、补助基础科研、政府采购、行政要求中,除了专利是中性的外,其他都是要事先针对特定产业,甚至产品和技术的。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产业升级上不该甄别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以发挥因势利导作用的想法,其实是要发展中国家自废武功。

当然,在政府的作用上,过犹不及,不及犹过。新结构经济学的研究希望能帮助发展中国

家避免结构主义的“过”之过,以及华盛顿共识的“不及”之过,使更多国家有机会摆脱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

最后,我同意刘海影先生所强调的“要维持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最重要的是增强中国经济体引进、创造与利用发展机会的能力,这注定必须以民间经济为主体来实现。”其实,这正是为什么新结构经济学主张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制度,政府发挥辅助性的因势利导的作用,以及中国应该深化市场体制改革,完成从双轨制向完善的市场单轨转型的原因。

不过,我也认为就当前国际经济形势而言,中国经济因外部冲击和周期因素而处于低谷运行,民间投资意愿低迷时,政府在推动结构性改革和完善制度以提高长期的、可持续的包容性增长潜力的同时,使用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来直接投资,或启动民间资金投资于像道路、地铁、管道、污水和垃圾处理和社会工程等会影响消费潜力、经济运行效率和产业升级的增长瓶颈限制是一石双鸟、化危为机的政策。

基础设施与经济周期

是政府主导的,而且存在一些质量、效率问题,在紧逼声言渐起时,受到的批评也更多。批评政府投资是可以的,而且很容易,因为批评企业投资会直面企业的质询:你怎么知道我这个项目不该投?你比我更了解企业?何况私营企业家对自己的投资负责的。

其实,对于基建的批评由来已久,绝非近年来的新发明。早在 1988 年,在 4 月的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上,著名经济学家千家驹作了《关于物价、教育、社会风气问题》的发言,其中严厉批评基建规模过大,引起能源、交通、原材料、外汇的紧张,引发通货膨胀,建议“在五年之内除能源交通和已经上马的基本建设之外,其他基建投资系统统统停止五年。”还有一个流传的版本,把上述建议简化为“三年不投资”,真假不得而知。

不知道是不是这一番发言起了作用,1989、1990 两年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增长-8.7%和 4.5%,远低于改革 30 年以来平均 24%的增速,直接导致那两年的经济也很萧条,GDP 增速分别只有 4.1%和 3.8%,远低于 30 年来的接近 10%的平均水平,为改革开放以来之最低,直到 1992 年邓小平南巡,才走出那一轮萧条。回顾那段紧缩历史,今人不知作何感想。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1988 年的基础设施绝对没有过剩,而且极度短缺。今天认为中国基础设施已经足够的人,面对不到发达国家 1/10 的收入水平,平均不到 1/3 的公路、铁路道路密度,以及严重的拥堵,应该重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很怪很怪的怪圈:宏观收缩时,产业投资不景气,如果再砍基础设施投资,经济下行必将放大,经济波动也会放大,这与政府经济调控的反周期作用正好是相反的,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本来应该是实行积极的政策,对抗经济下行的。

问题出在中国的经济周期的根源上:一般的经济周期分析中,假定经济下行的根源是外在冲击,政府采取政策对抗经济下行;而中国的经济周期,恰恰来源于政府主动的宏观调控。这时政府再想对抗经济下行,就好像是一只手按下了瓢,另一只手又想把它托起来,陷入左右互搏,无所适从的尴尬局面。

其实解法不是没有。上文提到,经济过热往往是因为信贷供给增加过快,引发通货膨胀

胀,治理通胀,完全可以用货币政策,毕竟通货膨胀终究是一个货币现象。同时,为了对抗经济下行,还是可以采取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比如减税,再比如增加财政支出。财政支出分为消费性和投资性,倘若不增加政府消费,就是增加政府投资,比如国防、教育、基础设施,往哪里投我都不反对。考虑到中国基础设施总量依然十分落后,不仅严重影响居民生活,也会影响未来长期经济增长,不妨未雨绸缪,增加基础设施投资。

今年的情况是,不但货币政策紧,财政政策也跟着紧,加上出口也不景气,导致经济很冷,一些企业的日子不好过。表现在数据上,GDP 增速很低,而且 PPI 已经连续半年负增长,企业利润大幅下滑,经济自主收缩风险增大。在这种情况下,林毅夫教授建言应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对抗经济下行,笔者是很赞同的,也曾写小文阐述基础设施与生产率、通胀、民生、长期增长潜力等方面的关系。

如此重大的事情,在如此复杂的关口,不同意见当然有的。尤其是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里面,一些质量、效率、腐败的问题总是存在,让人不由得不感到愤怒。然而,冷静下来之后需要厘清的是,我们是否应该因为出了一些问题就停止建设,或者是等官员都廉洁了,法治健全了再建设?

问题问到这里,答案应该是清楚的,我们只能在前进中解决问题,在调整中积累解决问题的条件,摸索问题的解法,而不是激化矛盾。“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这样的豪情让人激动,甚至向往,却未必能真正解决问题,而且往往不能解决问题,甚至让情况更糟糕。笔者笃信市场,热切希望有一天中国能建立完善的市场秩序,但是正因为笃信市场,才知道市场作为一种高效的运行机制绝非免费,而且极为昂贵,绝非朝夕之间能够建立,其他转型国家的经验也佐证了建立市场制度的漫长与艰辛。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想起胡适的一句话: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将近一个世纪以前胡适的这句话,是对人性中的简单化倾向的深刻洞见。倘若说改革进入深水区,问题当然会越来越复杂,不是简单化的概念或者“主义”就能解决问题的,而是要充分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寻找可行的解决思路 and 具体的解决方法。

中国经济的半个周期

今年国际黄金价格的走势实在让人纠结,经历了数月大跌之后黄金的走势一直稳中有跌,让很多经历并且参与了上一轮黄金大牛市的投资者难以相信:一年前还如日中天的黄金,怎么就莫名其妙地下跌了三成?虽然伯南克所说的“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还迟迟不见踪影,还离我们投资者十万八千里外,但明摆着“中国大妈”对于黄金的投资和消费需求都仍然旺盛,黄金为什么不能重拾牛市呢?

朱宁 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副院长

本文无意对黄金,或者其他任何资产的走势进行预测,而只想提出一个作为金融研究所发现的投资者决策中的一种趋势,或者也可以称之为偏差。投资者,特别是散户投资者在制定投资决策



的过程中,很大程度上难保证客观公正,而是会不由自主地受到自身经历和所处环境的影响。

美国近年有一项研究表明,投资者投资在股票类风险资产的兴趣和比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投资者是否经历过 1929—1933 年美国的大萧条和股市的大调整。那些经历过大萧条的投资者,在之后的整整一生的投资过程中,对股票的预期收益有较低的估计,不太愿意参与股市投资,即使投资于股市的话,也比其他投资者在股市中配置的比例更低。无独有偶,类似研究也发现,那些经历过美国债券市场大熊市的投资者,往往在今后的投资过程中表现出对债券这一资产种类的回避和保留。由此可见,投资者的个人经历对投资者的决策可以产生重大的影响。

说到市场环境,还有一则有趣的国际研究。在对美国和日本投资者在 1980—1990 年代二十年间的问卷调查中,研究者让接受调查的日本和美国投资者分别对今后一年日本和美国股市表现进行预测,结果表明,日本投资者一直对日本股市的表现更有信心,即使是到了日本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破灭几乎十年之后,适逢美国股市出现互联网泡沫

学术顾问:(按姓氏拼音排序)

巴曙松	蔡继明	陈东琪	陈栋生	陈佳贵
程恩富	迟福林	戴园晨	范恒山	樊 纲
高尚全	顾海兵	谷书堂	贺茂之	洪银兴
黄范章	贾 康	江春泽	金 碚	李成勋
李江帆	李文文	李维安	刘诗白	刘 伟
茅于軾	任玉岭	宋洪远	宋守信	宋养琰
谭崇台	王东京	卫兴华	魏 杰	吴 澄
徐长友	晏智杰	杨家庆	杨启先	张曙光
张晓山	张卓元	赵人伟	郑新立	朱铁臻
周叔莲	周天勇	邹东涛		

危机的九十年代末,仍有很多日本投资者坚信,日本股市今后一年的表现,会超过美国股市。由此可见,一段时间内的市场极端表现,会对投资者的信念和判断产生持久的影响。

中国的经济在过去三十年,非常幸运地经历了一个举世瞩目的高速发展的阶段。与此同时,中国的资本市场,从长期趋势看来,也呈现出和众多其他新兴市场类似的高于全球资本市场表现的优异表现。但是,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未平,也随着中国过去增长模式逐渐经历转型,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也逐渐从众人遥远的隐忧逐渐变成不争的鲜明事实。

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理论和运行规律,以及资本市场的长期历史经验都表明,经济增长和股市上涨中的周期性和波动性,其实是经济增长和市场上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甚至是核心的组成部分。任何一个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都会既有它的波峰,也有它的波谷,既有它的上涨,也有它的下跌。周期,是任何经济都必然,也必须经历的经济增长阶段。盲目地希望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人为地拉长或者熨平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上升阶段,缩短或回避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调整阶段,虽然从短期来看可能可以达到“保增长”和“促发展”的政策目标,但从长期经济增长来看,却也有进一步扭曲资源配置和风险定价之虞。

从长期经济增长来看,中国过去经济三十年,一直处于一个长期周期的经济扩张和上升阶段,而中国的股市直到 2008 年以前,也一直处于一个长期周期的上涨阶段。在这么长时期的一个历史上罕见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我们广大的政策制定者,企业家,投资者,都自觉不自觉地适应了经济高速扩张下的思维模式和风险偏好。而中国过去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延续,好像也更加坚定了大家对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信心和把握。

但是,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和中国股市,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其实还只走了长期经济周期里的半个(上升)阶段。我们的政策制定、企业投资融资决策、投资者的资产配置和风险偏好,很大程度上都依存于过去三十年的上升趋势会一直延续下去这一简单但关键的假设。而基于这种假设所做出的决定,很可能导致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在长期积累起难以根治的痼疾和难以化解的风险。纵观人类经济历史,这样的痼疾和风险,往往最终是很令人遗憾地以经济和市场危机这种极端形式得到化解的。

正如我们在海外投资者身上看到的那样,人类的行为和决策很大程度上会不由自主地受到过往历史经历的影响。而如何能摆脱这种影响而形成独立客观的判断,其实是区分投资者成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正如巴菲特所说,他的投资哲学不过是“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寥寥数语,说起来何其简单,然而纵观全球,有几人能真正做到?如果只是观察了经济发展的半个周期就仓促决策的话,无论政策制定者,企业管理者,还是各种投资者,都有可能让自己陷入到没有必要的,逐步累积的,和规模更大的风险之中。

热视角

美媒:中美制造业薪资差距收窄 岗位“回流”美国

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发文称,随着中国与美国的薪资差距迅速收窄,制造业岗位单边流向中国的局面开始出现变化。不过,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万宝盛华集团(ManpowerGroup)首席执行官杰弗里·约雷斯(Jeffrey J. Jorres)也表示,这不是“淘金热”,未来美国公司并不会将所有外包到中国的岗位都全部召回。文章指出,短短几年时间里,中美两国相对薪资水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约雷斯称,这种趋势正在加速:过去五年中国的年均工资增幅为 15%—18%,而由于中国正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更多地让消费者拉动经济增长,今年中国的工资增幅可能达到 20%。

总成本只比中国高 20%,而且这已经把运营在地球另一边工厂这项费时费力举措的成本考虑在内。在中国,专业人员的成本也在攀升。

不过,约雷斯也指出,未来美国公司并不会将所有外包到中国的岗位都全部召回。在中国修建的工厂将留在那里继续服务当地市场。然而,目前在那里的因素可为美国制造业招徕更多的投资。

约雷斯还阐述了过去几十年制造业变迁史。他表示,如今新兴制造业岗位在美国的出现表明制造业的全球化发展之旅已“环游”一周,又从原点“整装待发”。他表示,与其说这是一场“迁移”,不如说是一次“再次调整”之旅。

(环球网)